

崔凯文集

「戏剧戏曲卷」

崔凯 著

崔凯文集

「戏剧戏曲卷」

崔凯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崔凯文集. 戏剧戏曲卷/崔凯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41-4604-3

I. ①崔… II. ①崔…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戏曲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551号

总将花信报东风（总序）

郭兴文

崔凯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作为辽宁省文联主席，理当写上几句话。

崔凯是中国曲协副主席，曾任多年的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是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我认识他得追溯到2001年。其时，他陪同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先生到盘锦艺术创作基地采风，我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有幸陪同他们一道活动了一天。临别时，崔凯先生戏言“你早晚也得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当时只当调侃而已，不料被他所言中。2003年，我奉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文艺，一见面双方都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以前交往不多，这以后，除了我到省新闻出版局做了一年局长，工作少有接触之外，应该说与他总是工作联系不断，民间交往增多，对他的印象、感触也与日俱深。

崔凯在艺术上取得了令人钦慕的成就。他从1971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先后发表戏剧、曲艺、戏剧小品、电影、电

视剧、文艺评论等作品500余篇（部）。曾获得全国及省级各类奖项50余次。特别是作为东北喜剧小品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在他的带动下，东北形成了以张超、张惠中、何庆魁、徐正超、尹琪为代表的全国知名小品创作群体和以赵本山、黄宏、巩汉林、范伟、潘长江、黄晓娟、高秀敏为代表的小品表演群体，他们共同创造了“喜剧看东北”的神话，共同催生了喜剧小品这一新艺术形态，共同迎来了当代艺术发展史中一个喜剧小品时代的到来。这其中，崔凯起到了不容置疑的领军者的作用。他本人也由此被誉为“东北文化的活化石”。在这样一位与时代同步，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百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变迁，看到蓬勃昂扬的时代精神，而且也能体悟到作者寄寓其中的追求真善美的主题意蕴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

一个中医世家子弟成长为举国瞩目的文艺明星，是偶然还是必然，是与生俱来的天分，还是上帝的垂青？人们提出这些个问号或许都有些理由，但我以为注意力还是应放在他创作道路的探究上，这不仅是对崔凯先生的个人评价，而且将有益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有人说，崔凯创作上“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岂知，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始终把握着创作的“源头活水”。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东北黑土地，向生活要素材。用他自己的话说，“东北黑土地不仅肥沃，也产

生快乐幽默。对我来说，黑土地不但给我很多营养，同时也给了我非常丰富的创作资源。”这一点，他很像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一生几乎没离开过生养他的故乡本土，没离开过他的故乡小镇奥克斯福的杰夫生镇。在这个“邮票”大小的故乡本土上，他倾注了全部情感与才能，同时也创作出了大量世人瞩目的作品。崔凯也是同样，他的创作之根一直扎在故乡铁岭，以他特有的“农民情结”和“平民化”创作风格，去反映辽北地区农民的喜怒哀乐。为此，他走遍了铁岭的六县三区和绝大部分乡镇、村落。他经常到辽北的农村去采风，了解民情、体验生活，甚至盘腿坐在村支书的火炕头，一人一句地唱二人转，把基层群众的现实生活艺术化。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写出戏曲《摔三弦》，电影《明天我爱你》、《贵妃还乡》，电视剧《绿色的旋律》，喜剧小品《十三香》、《牛大叔提干》、《过河》、《红高粱模特队》、《送水工》、《不差钱》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受到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作品中的台词很多流行在群众日常生活中，被大家当做幽默调侃化解矛盾、消解烦躁的“良药”的根本原因。崔凯和福克纳的创作道路同时给出一个明晰的结论：一个作家艺术家，在历史的时空中生活，很难超越时代，但他却有可能利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去拓展表现空间，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致枯竭，在带给受众艺术审美的同时，还能够流淌出自己独特的深邃思想和哲学思考，进而给受众带来启迪。

“听唱新翻杨柳枝”

俄国作家阿斯塔耶夫说过：我们的前辈在我们面前树立

了一座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以至于稍有建树就得“另辟蹊径”。这是说艺术成果的取之不易和创新的必要与必然。崔凯的创作生涯已有几十年，按一般规律，很容易“江郎才尽”了，但他却总能“花样翻新”，不断给人们以新的惊喜，原因何在？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创新”。他是一位创新意识很强的作家，这种创新意识来源于他的艺术清醒与自觉。“艺术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这是崔凯于2010年9月14日获得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后的“获奖感言”，也是他创作成功的“道白”。

崔凯的艺术创新不是一般的“标新立异”，而是在理论指导下，或者经过理性思维后的艺术实践活动。他的《创新曲艺理论，促进曲艺繁荣》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创新观。崔凯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没有把曲艺创新局限于意义层面，而是着力研究曲艺创新的“路径”问题。他指出，曲艺创新首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完全脱离传统说唱艺术的基本特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其次，曲艺创新要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实行。创新要改变简单叙事浅、白、直的问题。作品要新、要美、要深刻，在表现形式上要适应新的传播媒体和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再次，曲艺创新要实现杂交和新创的结合。让完成历史使命的曲种在另一种方式下再生，以“杂交”的优势显现新的生命力。比如网络说唱、电视说唱、评弹电视剧等。在崔凯的创作生涯中，他是以创作拉场戏成名（二人转中的群活儿）的，在此后的小品、影视剧创作中，又有许多二人转元素的融入和浸润。大家所熟知的《红高粱模特队》、

《不差钱》、《过河》等小品都运用了大量的二人转元素。这些二人转的说口、绝活、歌舞等元素，它们的喜剧性、鲜活性、灵活性，为喜剧小品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创造力，使喜剧小品“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正是由于崔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如今小品已经从一个艺术院校表演专业学生的作业，发展成今天有独立的艺术样式和理论体系的舞台表演艺术形式。最值得称道的创新是，他以极大的勇气实现了二人转与电影的有机结合。众所周知，自1905年《定军山》搬上银幕起，戏曲电影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中，京剧、越剧、昆曲、豫剧、黄梅戏等，都曾利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得到更大空间的展现而扩大自身的影响。但作为“草根艺术”的二人转，虽然也是我国现有四百多个剧（曲）种中的一个，但多年来却始终是难登大雅。近年来，虽然频频在电视剧中出现，也是仅仅为“东北风”提供些点缀而已。尤其是近年来，二人转渐渐走入困境，新编剧目水平不高，且许多剧目由于失去传统根基而成了“四不像”、“百衲衣”。而一些传统老戏，则因不合当代审美趣味，传播不广，几近销声匿迹。在这种情况下，崔凯敏锐地发现了作为曲联体的二人转与其他“板腔体”戏剧相比，更接近电影艺术要求的写实风格，更接近人物的自然状态，可以与电影艺术“无缝对接”。他领衔创作的二人转电影《贵妃还乡》成功地体现了他的艺术创新理念，这一创举“弥补了中国戏曲电影的空白”，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在二人转电影这一大胆尝试的基础上，崔凯探索了二人

转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如“交响乐形式的二人转或让二人转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发挥”等，并创造性地提出二人转艺术发展的方向应是“以二人转为母体，东北风格的音乐剧”。他的这些创新思考和建议，打破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墨守成规，不仅对二人转剧种的发扬光大，而且对打破整个曲坛低迷的状态都具有高标起俗的作用。

“衣带渐宽终不悔”

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最大张力是追求。没有追求便一事无成。崔凯的艺术道路，再次诠释了这个观点。崔凯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执着追求精神的作家，他始终追求的是以自己的作品生动形象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关心社会、关爱人生，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总是力争使自己的作品让人民大众获得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启迪。特别是在当下，一些文艺家在唯美主义的旗帜下，不情愿涉足政治和道德领域，弱化乃至完全丧失了对社会、人生的道德关怀和评价，甚至以展示所谓人生的底色和原生态为标榜，不分善恶，泯灭美丑，以迷茫、混乱甚至颠倒的价值取向来误导受众。与此成为鲜明对照，崔凯更加注重了自己作品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蕴涵，更加注重葆有作品的人文深度和思想力度，更加注重自己作品的道德承担。他的《摔三弦》、《看春花》等作品，即以鲜明生动的地域特色和浓郁朴实的乡土气息，实现了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中崭新道德风貌的聚焦。他的喜剧小品《牛大叔提干》，通过牛大叔冒名顶替马经理并以此换取为小学校解决御寒玻璃而未果的“陪酒演习”过程，以“悲剧喜唱”的

方式表达了沉重的主题，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在与主人公一道挥洒着嬉笑怒骂的宣泄中，鞭挞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腐败现象。而《对缝》对不正当竞争行径的抨击，对欺骗、虚伪、贪婪、自私的嘲讽；《红高粱模特队》对广大劳动者质朴美学观的揭示；《送水工》以更深邃的视角对现实的审视等，都反映出了崔凯对营造新型的人际关系，形成全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而体现出的一种责任担当和自觉追求。正是崔凯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使得他的作品时代意义和人文关怀格外鲜明，构成了他作品精神内涵的强大支撑点。

崔凯的“担当”意识，不仅体现在创作上，还体现在文艺批评上。当下中国文艺批评存在着“游戏化”、“作秀化”和“浅表化”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不论文艺家还是广大读者、观众，都纷纷呼唤、倡导真正客观的、科学的、说理的、对文艺创作有真正帮助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崔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文艺批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的《中国喜剧缺什么》、《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再思考》等文章，为当今的文艺批评界吹进了一缕新风，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从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努力遵循艺术规律，健全和完善文艺批评标准，着力创新文艺理论开创文艺批评的新局面等方面，就加强和改进当前文艺批评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切中当前文艺批评的要害”的评价。他的几十篇文艺评论都可以看做是他心系文艺发展繁荣，援疑质理、激浊扬清的责任

意识、追求精神的写照。

古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但对崔凯而言，却是人到花甲万事忙。而且忙而有乐、忙而有成、忙而有为。如今，他已卸任省文联的领导职务，当会有更加充实的时间而专心于艺术创作，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砥砺，他一定会使自己的创作更加精美老道。“庾信文章老更成”，我衷心地祝愿崔凯先生在人生“第二个青春期”里，继续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为时代、为人民，为文艺特别是中国曲艺的发展繁荣，催马扬鞭，凯歌频奏！

是为序。

2011年3月31日 于沈阳

（郭兴文曾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省文化厅厅长，现为省文联主席——编者注。）



黑土魂魄 大众情怀（代序）

孙 浩

崔凯这个名字，总是与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优秀舞台作品联系在一起。不佞早在上山下乡时期，就经常读到他发表于省内各类文艺刊物的戏剧曲艺类作品，那时的他，已经形成了广泛的艺术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辽宁大地一批明星级喜剧艺术家的崛起，崔凯的作品进一步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他成为这些艺术家身后的擎天巨手，为其助力，为其掌舵，为其添彩，为其提供不竭的才思。其艺术才情，直如春江之水，破冰决堰，奔流直泻，一发而不可收，逐渐形成了他的作品直面现实、关心大众、晓易畅达、幽默风趣的艺术特点。这些作品经由优秀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尤其经过电视媒介的广泛推演，其艺术影响力迅速达于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崔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辽宁这块文化热土培养出来的一代最具艺术影响力的剧作家。

纵观崔凯的全部作品，无不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民族民间文化色彩和独特的东北地域文化精神。在文化、心理、情感和意识上，与东北黑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群体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尊重、热爱、亲近这些质朴的劳动人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生活，农民的家庭琐事，农民



的酸甜苦辣。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农民创作，表现他们的忧欣苦乐，意欲奋争。这样一份执着与坚韧，不但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坚实崇高的。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美，就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居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中。在文艺的理论和实践中，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课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物质诱惑和五彩缤纷的生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艺术和创作，也在这场历史巨变的洪流中涌动变异，各种思潮和主张活跃发展。单纯地张扬艺术家自我，主张玩艺术，关在象牙塔里，在狭小的哥们圈子里造艺术、侃艺术，成了不少艺术人的时尚，并引以为傲。像崔凯这样不抄近路，不尚空谈，扎扎实实地徜徉在生活的海洋里，为人民而创作，为大众而歌的作家当真是多乎哉不多也。为此，崔凯对自己创作方向的坚守就不能不令人油然而敬。作家、艺术家的主体心灵自由只有和社会责任、接受群体结合起来，创作才有价值，作品才有生命。

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观察者和发现者，崔凯有一颗童心、善心、爱心，善于把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矛盾冲突和生活际遇以鲜活生动的喜剧形式幽默地表现出来，让观众在领悟内涵和精神的美感后发出会心的笑声。像表现当代城乡爱情观变化的独幕喜剧《约会继续》，以独特的人物性格，俏皮的戏剧语言，制造出令人捧腹的戏剧冲突，把当代劳动人民变化了的价值观、婚恋观表现得灵动幽默，饶有趣味，在笑声中给人以启迪。而表现党和政府棚户区改造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崭新变化的短剧《会亲家》，把农村种粮大户的幽默和城里工人的机智表现得相得益彰，几乎是一句一个彩，令人忍俊不禁。在酣畅的笑声过后推出“为明天干杯”的主题，堪称是“含笑谈真理，四两拨千斤”的精彩之作。

正是这种对广大劳动人民深厚的情感使然，崔凯的作品中，洋溢着一种其诚在心、其真在骨的大众情怀。这个从辽北黑土地走出



来的剧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实实在在，心甘情愿，充满激情地为普通百姓创作，大众口味、大众心理、大众情怀，是他艺术创作一以贯之的文化自觉。这既体现在他作品的选材上，也体现在其风格建设上；既体现在人物性格上，也体现在内涵开掘上。这种追求，小而言之，是作家个人对创作取向的定位，个性化创作风格的确定。而在根本上，则是对艺术创作正确方向的坚持，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的源泉。”这一观点，直到今天对艺术创作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思想精髓永远也不会过时。坚持“为人民大众”而创作，永远是当代中国广大作家、艺术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不必讳言，今天中国的文艺舞台，在精品迭现、百花盛开的同时，各种文艺思想和艺术主张纷至沓来，多样化的艺术选择和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少人忘记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有方家公开撰文称，我的作品就是我个人玩的一场游戏，观众爱看不爱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作品不是给现代人看的，而是给五百年以后的人看的等等。在这样的艺术主张下形成的作品，只能是云山雾罩、光怪陆离的主观呓语，没有社会价值，没有对生活新的发现，没有对人的尊重。当一个作家陷入对他人、对生活了无情感，对社会丧失了责任感的时候，他只能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他的作品只能被生活唾弃。

崔凯是那种尊人民为父母的作家，他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社会之公器。从踏入创作领域那一天起，就立志为大众而写作，他的创作从未离开过农村、市民等最普通、最一般的寻常百姓。像拉场戏《闹鱼塘》里泼辣、固执的胡二婶、田大妈，既充满个性，又诙谐滑稽，心地善良，表现出普通劳动者的质朴可爱。大型秧歌剧《马



兰花开》中一代新型农民马兰、憨直内敛的牛奔，性格本身就具有喜剧性，表现了东北农民达观爽朗的性格特征。这种人民性的艺术追求，体现在崔凯全部作品中，这就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不禁令人想起当年柳青、赵树理等前辈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厚情感，终其一生为农民写作的文化追求。在这一点上，崔凯与前辈作家达到了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

为大众创作，为大众服务，就要创造出人民群众喜爱的、适合他们审美需要的作品。崔凯的创作，就是在自觉地实践着一条文艺创作民族化、民间化、地域化的创作道路。毛泽东同志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要用自己的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和发展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对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真理性要求。任何文艺创作，无论它的艺术思想何等耸峙云天，无论它的内涵何等深不可测，无论它的外观何等缤纷绚烂，它都应该而且必须在形、神、内、外等各方面特征上，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时代、一定的地域的文化特征相适应。离开了这一点，艺术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形成，必然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必然要在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的土壤里汲取营养，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艺家共同遵循的艺术规律。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继承了俄罗斯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阿瑟·密勒的戏剧创作经受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文化冲击一样。法国印象派美术大师莫奈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创作：“塞纳河啊！我这一生都在画她，在任何时刻、任何季节……我从来不会因此感到厌倦，她对我而言一直都是崭新的。”这是一种对家乡、对土地、对特定人文历史的真挚情感，有了这种情感，作家艺术家的激情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种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自觉开掘，是文艺创作形成个性、走向大众的重要途径。崔凯注重从东北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



选取创作素材，他的作品洋溢着令人着迷的东北味、农村味、人情味。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三味”，才使他的作品充满魅力，为全国广大观众所接受和喜爱。东北民间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东北人民性格深处那种豁达爽朗、乐观幽默的特点。东北二人转中丑角的表演最能代表这一特点。崔凯的拉场戏《摔三弦》，把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拨弄三弦算命挣钱的盲人张志出于为儿子挣钱办婚事的良好愿望，重操弃之多年的算命旧业，而且误打误撞地算到了尚未谋面的亲家母头上，造成一连串的喜剧冲突。其幽默诙谐的唱词，智计百出的对白，妙趣横生的情节，加上喜剧大师赵本山精彩绝伦的表演，把拉场戏这一东北民间戏剧形式演绎得妙到巅毫。愚以为，这部作品，堪称我国民间文艺喜剧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而表现摒弃农村陈旧婚恋观、青年男女自主恋爱、触动老年人也改变生活观念的评剧《鸳鸯扣》，把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表现得生动传神。神话歌舞剧《取经路上》，虽然取材于传统二人转《猪八戒背媳妇》，却能别开生面，旧曲新唱，把东北民间艺术幽默喜兴的艺术特点表现得生动活泼。他还写过取材于沈阳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大型民族歌舞剧《雁叫长空》，反映东北农村现实生活中社会问题的八场秧歌剧《新娘泪》等剧目，无一不保持着他的作品民间化、地域化的特点。

选择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形成什么样的创作风格，从根本上来说，源自作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李渔主张戏剧要让观众喜爱，要能消解观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忧虑、愁闷，让他们发出源于内心的笑声，达到愉悦身心，调整精神的作用。所以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连“一夫不笑”都成为忧虑，可见李渔对喜剧效果的重视。他在《闲情偶记》中把“重机趣”作为重要篇章：“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



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崔凯戏剧创作的突出成就是喜剧色彩，他的作品机趣横生，赏心悦目，令观众心神为之一朗。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创作取向与先哲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看他的作品十分轻松，不会皱着眉头去分析猜测，不会被艰涩古奥的理念折磨得费劲心机去揣摩，它会让你始终处于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悦、欢笑之中，看过之后更会为其中的幽默、诙谐的文化元素所感染，进而对人生有所悟解。

在目前全国缺少优秀喜剧的大环境中，崔凯的喜剧创作显得独树一帜。喜剧需要幽默，需要智慧，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扎实的生活积累，更需要艺术创作澎湃的激情。喜剧产生于性格，它的翅膀是冲突、情节和语言。有了喜剧化的性格，才可能有喜剧化的人物和喜剧化的行动，进而形成喜剧冲突和喜剧语言。这些，无论在《摔三弦》的张志身上，还是在闹鱼塘的胡二婶、田大妈身上，抑或是在《马兰花开》中的马兰、牛奔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戏剧舞台上耕耘了四十余载的崔凯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成为辽宁乃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他为社会创造的欢乐，他为人民生活添加的色彩，他为中国戏剧百花园奉献的人物和艺术个性，必将对对中国戏剧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长久地为广大观众所铭记。愿他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继续为社会、为生活、为他时刻铭记在心的广大观众奉献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更多的欢笑之声。

祝崔凯先生身康、心娱、笔健。

2011年5月6日于盛京少师府

（孙浩现任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戏剧评论家——编者注。）